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

1930

代序

下面的工作，是荷兰的国际共产主义团体（GIK, or GIC/the Group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s）集体研究的成果，它在其结构上表现出了内容的高度协调统一，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积极的集体努力成果。文本起草时采用了集体工作的方法，这在实践中证明了一个自觉奋进的团体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这只是具有如此巨大和久远价值的其品质之一。

通过这项工作，国际共产主义团体在战后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在使用价值经济的基础上，安排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实际可能性，以供人讨论。他们把先前工人阶级的理论代表从早期的尝试中所积累的，以求解决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所有领域中最终极的、最决定性问题的经验集中在一起，以便揭示让先前的一切努力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根本原因，从而避免进一步混乱的产生。

另一方面，本书以科学共产主义的既定原则为出发点，并把这些原则与前人的在任何程度上都有积极意义的工作相结合，同时揭示了新的社会关系和经济上的相互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在总体上为共产主义经济学建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本书不仅关注工业领域经济改造和建设的必要性，而且揭示了与农业经济有关的必然联系。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成长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其整个经济有机体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特点的规律模式。

简洁的语言和所采用的明确的分析方法，对每一个有阶级意识的工人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就保证了每一个勤奋学习后续书页的革命者也能充分掌握其内容。写作的明确性和严谨的客观性，同样也为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广泛讨论空间提供了可能，这个空间可以把工人阶级队伍中有代表性的各种意见派别都吸引到它的领域中来。由于我们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必须对这里所设想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最彻底的讨论，因此，有于下面的论述，我们立场的最终表述，将留待以后再说。

不过，我们有一个愿望，想对这个文本提出来，以帮助它继续前进：当所有革命工人都有意识地读完它的书页，并把其中所积累的经验实际应用于争取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时，《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这部著作就会最终地、永远地证明它的成功！斗争是艰苦的，但最后的目标是值得的！

柏林，1930

总工会（AAUD）

德国革命工厂组织/ REVOLUTIONARY FACTORY ORGANISATION OF GERMANY

第一章 国家共产主义还是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

1. 国家共产主义

俄国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所作的种种努力，已经把以前只能在理论上加以处理的领域，至少就工业生产而言，引入了人类的实践领域。俄国企图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安排经济生活......而在这一点上却完全失败了！工资的增长不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的失败。1由社会生产制度所实现的更大程度的生产力，并没有带来在社会产品中与其相称的更大份额。（A greater degree of productivity achieved by the system of social production brings with it no commensurately greater share in the social product.）这表明，剥削是存在的。亨丽特·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e Roland-Holst）证明了今天的俄罗斯工人是雇佣工人。人们可以试图轻描淡写地指出，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私有制仍然存在，正因为如此，雇佣劳动的基础必然会强加到社会生活的整个经济基础之上。凡是认为这种解释令人满意的人，可能确实是在客观上正确地认识了当今俄国的经济基础，但是对于俄国人实行共产主义经济的巨大尝试，这个人还是一无所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无产者对俄国人正在采用的、据说会导向建立共产主义的方法产生了怀疑。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方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工人阶级没收了占有者，把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交给国家，然后国家着手组织各工业部门，把它们作为国家垄断的行业交给社会支配。

在俄国，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能够控制工厂并在自己的管理下继续经营它们。共产党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支配者，发布了一些指令，根据这些指令，工厂要把它们的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在乡、区、县三级联系起来，以便把整个工业生活统一成一个有机单位。生产机关（production apparatus）就是这样从劳动群众强大的活力中组建起来的。这是存在于无产阶级内部的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动力的一种表现。一切力量都朝着生产集中的方向发展。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

“人民经济的集中管理，是胜利的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生产力最迅速发展的最可靠手段……它同时是对人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把小企业纳入统一经济结构的前提条件。集中化是避免人民经济任何分裂趋向的唯一手段。”2

正如在这一发展开始时，情况的基本因素在于工业生产管理的控制权掌握在群众手中一样，同样不可抗拒的是，在以后的阶段，这些权力也不可避免地会转移到中央管理机关。如果说起初各局、公社委员会等是对工人群众、生产者负责的话，那么到了最后，它们就成了中央管理机关的附庸，由中央管理机关指挥全局。一开始：自下而上的负责；最后：职责来自上层。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俄国实现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土地都不曾尝试过的生产力的高度集中。被迫与这样的权力机器作斗争的无产阶级，真是悲哀！不管其余怎样，这就是俄罗斯所面临的现实！现在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俄国工人是雇佣劳动者，是被剥削的工人！这些工人必须为他们的工资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斗争！

我们在这里要提请大家注意的基本问题是，在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中，无产阶级对生产机器没有控制权。在纯粹的形式意义上，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它对生产资料却没有处置权。生产者在社会总产品存量中究竟可以得到多少比例的劳动报酬，是由中央管理机关决定的，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中央管理机关就根据统计数字来决定。实际上，是否应该进行剥削的决定权在中央机关。即使是由一个仁慈的政府来指挥，然后以公平的方式分配产品，它仍然是一个把自己提高到生产者之上的机构。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状况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情况而出现的，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独有特点，对每一个与生产和分配有关的中央管理机关来说都是典型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建立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确实会很成问题。

2. 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仅除马克思外，我们发现，在几乎所有关心共产主义社会中经济生活组织问题的作家那里，他们所主张的原则与俄国人在实践中所运用的原则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以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为根据：“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3然后，他们开始着手进行集中化的任务，并开始构建类似于俄国人所号召建立的那些类型的组织。例如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这些名字还可以由一大堆其他的“专家”来扩展）这样写道：

“依据现有的自然和人工的生产条件决定制造新产品的方式、地点、数量和手段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的和全国的委员会。他们借助有组织的生产统计和消费统计的一切手段，把握杜会的需要，从而以自觉的预见、按照他们自觉地代表和领导的共同体的需要，组织整个经济生活。”4

而纽拉特更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经济科学只承认一个单一的经济主宰：它不计较盈亏，不流通任何形式的货币，无论是贵金属还是反映经济计划的‘劳动货币’，在没有任何会计控制单位的帮助下组织生产，并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分配生活资料。”5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们都得出了与俄国人所建立的社会体制相同的结论。即使我们假定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可行的（我们否认这是事实），并且中央管理机构和社会控制机构愿意或能够按照公认的不同的生活水平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大多数的产品——即使这样，即使我们假设所涉及的无数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生产者实际上没有权利控制生产机关的事实仍然存在。它不是生产者的机关，而是置于他们之上的机关。

这种状况只能导致对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对行政当局采取反对立场的团体的强制镇压。*中央经济权力同时也是政治权力。*凡是在政治或经济事务上希望以不同于中央管理机构的方式安排事务的反对派，都将受到强大国家机器一切手段的镇压。当然没有必要给出具体的例子——它们已经够让人熟悉了。这样一来，马克思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就变成了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监狱国家！

俄国人，和其他理论学派一样，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宣称他们的理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但实际上，这与马克思无关。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以共产主义术语呈现的资本主义管理和生产控制。布尔什维克倾向的历史观点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他们观察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程是如何受到程度越来越大的社会化控制的。商品的自由生产者处处受到工会、托拉斯等的限制；生产确实已经是“共产主义的！”：

“对资本主义思维方式的克服，作为一种初生的社会现象，就假定需要实现一种覆盖面极广泛的过程。社会主义很有可能首先将自己确立为一种经济秩序，因此，社会主义者将首先通过社会主义秩序产生，而不是反过来，社会主义秩序由社会主义者产生——此外，这一顺序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6

如果经济以这种方式变成了“共产主义”，那么只需要转变生产关系，使生产资料成为国家财产，然后：

“……社会有计划的根据社会和每个人的需要对生产进行调节，以取代社会生产的无序状态。”7

在这种由计划决定的控制基础上，他们再进一步构建他们的制度。为了使计划得以完成，只需要设置一个新的管理机构来负责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关——共产主义社会就在那，现成的！

根据这种共产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只需要安插一个新的管理机构负责管理生产，以便在统计数据的帮助下，在所有可能的最好的“共产主义”世界里，把一切安排得最好。这种观点在意识中的基本来源是这一事实：那些想出这些主意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不能把计划生产的增长看作是劳动群众自身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只能把计划生产的发展看作是他们——经济专家——被要求贯彻和完成的一个过程。不是工人群众，而是他们——领导者——注定要引导破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进入共产主义。掌握知识的是*他们*，思考、组织和命令的是他们。群众要履行的唯一作用，就是支持他们以自己的智慧所决定的东西。凌驾在劳动人民群众之上的是经济专家和领导人，带着他们的科学，受到大众的尊敬，被视为社会奇迹的殿堂守护者，而这个殿堂对群众来说仍然是封闭的。科学将成为伟人们的财产，新社会的光芒就是从他们身上发出来的。不用说，在这种形式的社会中，生产者对生产没有任何控制权或管理权，因此，此处描绘的图景实际上代表了马克思关于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概念的一个奇怪版本。

所有这类计划都明显地带有诞生它们的历史时期所给予的印记：在这，*就是机械科学发展的时代*。生产系统被设想为一个复杂精细的机械装置，它通过数千、数万个齿轮和传动杆发挥作用。生产过程的各个部分彼此拼接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就像分离但相互依赖的传送带的部分功能一样，像现代工厂——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到处都站着生产装置的控制员，他们通过统计数据来控制机器的运行。

这些机械式的计划起源于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认为共产主义主要是一个组织-技术过程的编排问题。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如何确定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的基本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就这种机械的观念而言，必须找到使生产者自己能够建造生产体系的基础。这种建造行为是一个从下往上而不是从上往下进行的过程。这是一个由生产者自己来完成的集中的过程，而不是像天堂的魔法从上面落在他们身上那样。如果我们想牢记革命的经验，遵循卡尔·马克思给我们的指导方针，那么，我们甚至现在就有可能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明显的进展。

3.国有化和社会化

虽然没有人给我们留下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详细描述，但采纳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即这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在本质上将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并将完全独立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理论而产生，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生产和分配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不是国家，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本身，这些职能将落到他们身上。

改良派在这些年里把这种理论完全上下颠倒了。争取社会改革的斗争和各工业部门稳步地转变为国营或市政经营企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稳步地走向共产主义。只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任何一个特定生产部门达到这样一种集中程度，以至于它能作为中央管理下的一个直线职能结构（unitary structure）运作，那么这就表明将其国有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改良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设想通过持续和渐进的国有化过程实现共产主义，而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倾向认为，为了完成国有化过程，革命是必要的。*因此，从莫斯科来的人的观念是建立在与改良派的理论方法基本相同的基础上的。*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那些已经成熟到可以国有化的工业单位将通过国家来经营，而经济中尚未充分集中的部分将继续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

俄国革命就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的。1917年，俄国的生产者开始在整个经济体中征用有产阶级的财产，目的是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安排生产和分配。征用的过程是从下层开始的，这使那些希望从上层领导和管理经济的人感到非常困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俄罗斯经济管理部门将许多被工人们没收的工厂归还给了他们从前的老板，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工厂还不够“成熟”，来实行共产主义管理。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是作出了如下决定：

“在生产组织领域，必须实行最终的国有化措施。必须从对单个企业实行国有化措施（截至目前已有304家），发展到对整个工业实行统一的国有化。*国有化一定不能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必须只能由人民委员会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授权批准下实施。*”8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实行国有化与实际的共产主义社会化概念之间的区别。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看到了被认为已经具备成熟的共产主义条件的工业企业与条件尚未成熟的企业之间的区别，这显然是马克思从未想过的概念。弗兰茨·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H. Beck编辑的《社会化的方法和目的》（’Methods and Aims of Socialisation’）专题讨论会中非常正确地指出：

“把对个体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市政化（municipalization）当成社会化的一种形式，人们认为这种流行的描述正在逐步推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化’概念，这是一种错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本难以理解和神秘的‘成熟的企业......’才会得到强调。然而，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走向成熟。按照他的说法，单个的工业单位或这些单位机构的分支，很少能够变得‘成熟’和‘为社会化做好准备’，就像胚胎的独立器官在孕期的第四个月变得成熟，并被分娩出来独立营生一样。”9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国有化只会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成为一个庞大的雇主和剥削者。”10

但是，目的不应是限制群众的活力，他们自己也在进行社会化的过程，而是要把群众作为活细胞纳入共产主义经济的整个有机体中——而这一发展，反过来说，只有当合适的一般经济条件存在时才有可能形成。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就能使自己将他们的工厂纳入社会生产的整体范围中，从而决定生产者与社会产品之间关系的基础。

据我们所知，唯一试图在这类问题上讲真话的作家是改良主义者亨利·柯饶（H. Cunow）。他说：

“归根结底，与科布登学派（Cobden School）相反，马克思的意图是对经济过程实行固定的控制。*但是，不是通过国家，而是通过社会主义社会中联合起来的自由团体。*（…*the unification of the free associations of the socialist society.*）”11

柯饶在“对国家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否定”（”The Negation of the State and State Socialism”）的部分中，向我们展示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如何逐渐摆脱这种立场。最初，运动反对那些希望将诸如铁路和矿山等大型企业纳入国家管理的倾向。一个例子就足够说明了。在上述著作的第340页，我们能知道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在一篇文章中如何阐述这一观点的：

“逐步将一个个工业企业国有化的意图，换句话说，是用国家代替私营雇主，仅仅是换另一位剥削者来继续资本主义工业……它（国家）以雇主的身份出现在私人雇主的位置上，工人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然而国家确实加强了权力和压迫手段。资产阶级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它无法永远抵御社会主义思想的浪潮，我们也就越接近国家社会主义能被真正宣称的那一刻，而民主所要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将在“向社会民主主义前进，向国家社会主义前进！”的口号下进行。12

柯饶随后证明，这种立场在1900年之前就已经被抛弃，1917年卡尔·伦纳（Karl Renner）宣称：“国家将成为社会主义的杠杆。”（见：《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国际》，Marxism,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柯饶完全同意这一点，但值得称赞的是，他清楚地表明，这一切与马克思无关。柯饶抱怨马克思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分如此鲜明，而在他看来，这种区分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概念。

布尔什维克按照“成熟”的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像在俄国实行的那种做法，实际上是掴了马克思主义一巴掌。事实上，他们把自己的效忠转移到了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上。在俄罗斯，这种做法已经在以最压迫的方式让人感受到它的结果。社会不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这些都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他们“以社会的名义”（恩格斯的说法）任命和管理一切。这就是说，他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手段镇压每一个试图反对新剥削形式的团体或个人。俄国本应是共产主义的典范，却通过这种手段发展成为社民主义未来的理想。

我们已经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这种类型的国有化，以便说明这与马克思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的名誉实际上也因此受到了损害。特别是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马克思才开始接受这一观点：*对经济的组织安排不能通过国家来实现而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联合体来实现*。随着对无产阶级为革命阶级斗争、为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而组织起来的确切形式——工人委员会——的发现，必须被历史唯物地（historically）建立起来的生产者自由联合的社会，其历史基础就显露出来了，并得到了充分的揭示，供所有人认识和理解。

4. 社会平均劳动时间

因此，马克思对“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的概念采取了自己的立场。然而，这种联合体与目前流传的“互助”的模糊概念毫无关系，而有其非常物质性的基础。*那个基础就是计算生产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正如本文将证明的那样，这与价值毫无关系。这与恩格斯的观点也是一致的，这可以从下面的内容看出：

“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因此，到那时，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不断波动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产品中包含的、现在已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的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来表现这个量，而是会用它们的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13

马克思还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作为计算单位的劳动小时数。在他著名的“孤岛上的鲁滨逊”的讨论中，他关于这个岛上的居民说过：

“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14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15

我们在这里看到，马克思在他的“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团体”（”Association of Freely Associating Producers”）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设想了劳动时间的计算方法，而且确实是在与劳动小时数的同一的基础上设想的。然而，马克思已经让他的自由联合生产者代替了鲁宾逊，我们现在明白，我们同样可以很容易地把共产主义放置的社会簿记系统置于社会的支配之下，从而得出对马克思文本的以下解读：

“它的存货账本包含了它所拥有的有用物品的目录、生产这些物品所需的各种操作，最后还包含了生产具体数目的这些产品平均花费的劳动时间。社会成员和组成其自身创造的财富的物品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如此简单和透明，任何人都可以理解。”

马克思假定这种社会簿记制度普遍适用于劳动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过程；这就是说，不论共产主义是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是已经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它都一样适用。换句话说：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生活的组织可能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但所有这些阶段的稳定基础仍然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单位。*（*but the stable basis for all of them nevertheless remains the unit of average social labour-time.*）

马克思确实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例如，这一点从他不厌其烦地特别强调说明——分配可以采取各种形式——这一事实中就可以看出。纽拉特由此推断，马克思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暗示着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产品*如何*被分配。对这样一个“马克思专家”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错误。纽拉特肯定知道，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对自由一无所知，而他只知道在功能上被派生出的内在必然性（functionally derived organic necessity）。就分配制度而言，它的选择自由被生产制度所规定的结构限制在了一定范围之内。然而，这一点需要作某些修改，稍后我们将讨论这些修改。

“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16

如果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就能够很好地提供一个基本范畴，来决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适用于生产领域的经济调节和会计控制的方法，那么，在分配领域，他则纯粹通过举例来证明这一点。因此，他进一步写道：

“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17

马克思在书中的其他地方还指出，他认为劳动时间是共产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

“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18

如果是以个别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个体产品消费的尺度，那么大部分的产品也必须按照同一尺度来衡量。换句话说，这些产品一定打上了印记：它们包含了多少人类劳动力，以时间衡量就是，包含了多少社会平均劳动小时数。但是，这要假定其他各类生产的范畴（生产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等等）都是按照同一尺度来衡量的，因此，对各个单独的工业单位的生产进行会计核算控制的整个制度必须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为基础。那么，人们就可以很公正地宣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在劳动方面还是在劳动产品方面，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在这都是简单明了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纽拉特认为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很少，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自由选择”，这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如果马克思把个别劳动时间作为决定个体在产品中的份额的尺度，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他同时奠定了生产者与产品之间关系的基础，生产的基础也根据这种关系而确定。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一种计划的使用价值生产体系，如在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经济机关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否必然会导致一个把自己当成一种外来力量凌驾于生产者之上的体系？我们说：*不！在一个生产者与社会产品的关系直接表现出来的社会里，不存在这种危险。在每一个其他的社会形态中，如果这个原则不适用，那么生产体系最终必然要发展成一种压迫机器。*

5. 走向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

按其生产体制的形式，人类创造了一个旨在满足成千上万人需求的有机组织。在生产过程中，我们既消耗了自己的劳动力，也消耗了生产过程本身。从这个角度看，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一个消耗资源的过程；然而，通过这个破坏的过程，我们不断创造新的使用价值。被消耗的东西在同一过程中又获得重生。机器、工具、我们自己的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得到恢复，被重新生产，或被*再生产*。它是一股永不停息的改造过的人类的能量流，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能量。每一种具体的形式都是人力的结晶，我们可以根据创造它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来测量它。

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生产过程中不创造实物产品的部分，例如教育、医疗服务等。这里也消耗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形式是指导、照顾病人等。分配直接在生产发生中并通过生产本身进行，消耗的能量以其新的形式直接流向社会。由于我们能够及时地测量这些能量，生产者和产品之间就建立了完全确切的关系。每个个别的生产者与每个具体的社会产品的关系就变得完整而清晰。

在按照纽拉特或希法亭关于组织生产的计划的情况下，或像在俄国实施的那种情况下，这种关系反而是*完全隐蔽*的。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神秘的过程，而生产者自己当然比国家管理者对它的了解更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由上级机关把一定比例的社会产品分配给生产者，生产者必须充满信任地等待他们将得到的东西。这就是俄罗斯的情况。虽然生产力可能提高，虽然社会产品的数量可能增加，但生产者得到的份额却没有增加，也即，存在剥削。

生产者对此应做什么？什么也不做？是的，他们必须再一次扛起斗争的事业，反对剥削者，反对那些把生产制度控制在自己手中的人！人们可以试图让“更好的领导人”掌权，不过这当然不会消除剥削的原因。归根结底，除了重建整个生产体系，来使生产者与他们劳动所形成的产品之间的确切关系成为社会生产制度的基础之外，没有别的出路。然而，在这样的体制中，领导者和管理者分配产品的任务也被消除了。*没什么要分配的。*社会产品中的份额是直接确定的。劳动时间是用来确定总产品中个人消费产品比例的尺度。

无产阶级在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能否建立起生产者和产品间的这种关系，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权力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计划生产才有可能。各个独立的工业单位，乃至整个工业，就可以在横向和纵向上合并成一个单独的计划的整体，而所有部门都可以在以各种形式消耗的劳动时间的总核算中，自行计算它们所占的份额，这些不同的消耗形式主要是：机器的磨损、原辅材料的消耗和劳动支出。这种共产主义生产的基本编排和组织，能够而且实际上*必须*由生产者自己来实现，确实也能够*由他们自己独立*建立。于是，自由平等生产者联合体就成了一种绝对必要的东西。互相耦合和互相依存的制度自下层生长起来，正是因为生产者自己，以他们自己的权利，控制了运营和管理。现在已经创造了必要的机会，生产者本身的主动性得以表达，他们因此能够创造出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千姿百态的发展中的动人的形式。19

*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奠定生产者与其劳动产品之间基本关系的基石。有且仅有这一点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问题。*正如封建农奴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为了争取自己的那块土地和对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充分支配权而斗争一样，无产阶级现在也为了争取对工厂和其他工业机关的控制权和对生产的充分支配权而斗争——只有在新的社会法制条件中把生产者和产品的基本关系斗争到最终的结果才有可能。这里的决定性问题，正是无产阶级要为自己在社会中赢得什么样的地位；这问题是，在获得工作场所的劳动权的同时，无产阶级是否也获得了对这些工作场所的产品的处置权；或者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是否再次被宣称没有能力履行责任，而要把这种处置权委托给领导人、专家和科学家。归根结底，这场斗争的对象是那些认为在革命后自己注定要代表无产阶级来承担责任的人。正因为如此，只有首先奠定了共产主义生产的基础，与这些人展开合作才是合适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技能才可能为社会服务，否则他们只能发展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压制一切反对统治的东西，直到所有生产部门都足够“成熟”，可以由各自的最高管理机构纳入权力和行政的总体结构中。在“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的情况下，工人统治的目的是，依据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作为一切生产一般基础的原则，引进和实行新的生产、核算和管理制度，并为自由生产者自己控制生产和管理生产创造基础。而另一方面，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一般情形是最强大的镇压机器在中央机构的控制下被建立起来。至于自由联合的生产者的体制，它的作用是催生和促进那些力量，通过这些力量，它本身作为统治的职能逐渐失去权力，最终使自己成为多余的；*工人统治的作用是使统治本身在尽可能早的历史时刻消亡。*

我们不需要进一步关注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更应该着手研究，为什么在目前的历史关头，任何“理性的”人仍然会拥抱并坚持马克思的“天真的”观念，（人们认为这观念是他从其所处时代的自由-无政府主义倾向中衍生出来的）20即认为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不是通过国家，而是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联合体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经济生活的基本范畴应该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最重要的是，必须采取步骤，确保证明马克思的这种“天真”概念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可能基础。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同时也就表明，这个概念最初并不是在写字台后面诞生的，而是一种沸腾的、不断发展的革命生活活动的产物。

历数我们能够回顾的往事，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决定性的时刻，它们标志着我们对“共产主义经济学家”所唱的媚俗赞美诗的幻灭。第一个是苏维埃制度的自发发展和运作；第二个是俄国国家机器解除了苏维埃的武装；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幻想破灭的时刻，是被国家管理的生产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迄今未知的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形式。这些事实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更仔细的考察，这种考察表明，国家资本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社会生活本身已经通过其明确的表现形式——社会实践——以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制度的形式，把马克思的自由平等生产者联合体的概念推到了历史前沿，而在相同的时刻，同样的社会生活，连同它对理论和实践的客观批评，却把社会的实际权力交给了国家资本主义。

[1] Henriette Roland-Holst: Klassenstrijd (Class Struggle), 1927, p. 270.

[2] A. Goldschmidt: Die Wirtshaftsorganisation Sowjet-Russlands (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Soviet Russia), p. 43.

[3] 这当然是著名的《反杜林论》的引文，但是，应该指出，在本书第七章所引用的另一部伟大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观点作了相反的表述，即他一生的朋友和同事卡尔·马克思所采用的观点，即把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定义为“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

[4]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第一章

[5] O. Neurath: Wirtschaftsplan und Naturalrechnung (Economic Plan and Accounting in Kind), p. 84.

[6] O. Neurath: ibid., p. 83.

[7] 恩格斯，《反杜林论》

[8] A. Goldschmidt: Die Wirtshaftsorganisation Sowjet-Russlands (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Soviet Russia), p. 42.

[9] F. Oppenheimer, quoted by H. Beck: Sammelbuch über 'Wege und Ziel der Sozialisierung' (Symposium on 'Methods and Aims of Socialisation'), pp. 16-17.

[10] A. Pannekoek on "Socialisation" in Die nieuwe Tijd (New Times), 1919, p. 534.

[11] H. Cunow: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Band 1 (The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y, Society and the State, Vol 1), p. 30.

[12] W. Liebknecht: Staats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are Sozialdemokratie (State Socialism and Revolutionary Social Democracy) quoted by H. Cunow in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Band 1 (The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y, Society and the State, Vol 1), p. 340.

[13] 恩格斯，《反杜林论》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

[15] K. Marx: ibid., p. 171.

[16] K. Marx: Capital, Vol I, Penguin Books, p. 172.

[17] K. Marx: ibid., p. 172.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第十八章

[19]本段结尾处：“……因此能够创造出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千姿百态的发展中的动人的形式。” 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多么清楚地突出了这种制度的简单实用性！的确可以说，至少就生产控制的技术基础而言，计算机时代代表着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

[20] H. Cunow: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Band 1 (The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y, Society and the State, Vol 1), p. 309.

第二章 迄今为止在界定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

1. 马克思的门徒

对本来如此丰富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文献进行调查，就会发现，关于这种形式的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著作极少，而这种社会的目的是取代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我们找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分析，它的结论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把选择权摆在它面前，要么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后在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继续生产，要么——陷入野蛮状态。这一伟大的科学成就使社会主义脱离了乌托邦的范畴，使它站在了科学思想的坚实基础上。然而，关于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只给我们指明了几个路标，告诉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奠定这些基础。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他的《旁注》，即所谓《哥达纲领批判》。这种不希望以更大的篇幅来论述这个问题，只给我们几个指针的愿望，然而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什么错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把这些问题展开来加以全面考察，几乎肯定是不成熟的。这样的开端几乎肯定会以乌托邦而告终，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本人才警告说不要这样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禁忌知识之树的果实，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尽管俄国革命已经证明，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1

除了确定新的生产制度的一般基础外，马克思还指出了在新社会中可以应用的社会调节和会计核算控制方法，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按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核算。建立共产主义一般基础的前提条件是，货币和市场必须完全消失，而马克思的门徒们，他们完只全关心共产主义生产的基础，却没有再进一步。在共产主义中，他们根本上只看到了我们在资本主义下所知道的经济资源集中的延续，这将自发地产生共产主义。这种观点在希法亭的例子中体现的最清晰。他考察了资本完全集中在一个所有者手中的后果。他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巨型托拉斯的图景，并以下列文字描述：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将由一个主管机关自觉地进行调节，这个机关决定它的所有领域内的生产量。于是，价格决定成为纯粹名义上的，仅仅意味着总产品在卡特尔巨头为一方和大量的所有其它社会成员为另一方之间进行分配。那时，价格将不再是人们之间发生的物的关系的结果，而成为物在人们之间进行分配的单纯的计算方式。于是，货币失去了作用，因为要完成的是实物的分配，而不是价值的分配，所以货币会完全消失。随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失，物的外观的消失，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消失，从而货币也消失。由卡特尔分配产品，物质生产要素被再生产出来并用于新的生产。在新产品中，一部分分配给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其它部分留归卡特尔随意使用。这是一个以对抗形式进行自觉调节的社会。但是，这种对抗是分配的对抗。分配本身被自觉地调节，从而使货币的必然性消失。这样，在它的完成的形式上，金融资本脱离开它赖以产生的土壤。货币流通变得不必要了，货币的不息流动达到了它的目的地，即被调节的社会。流通的永动机找到了它的最终归宿。”2

根据这一理论，向共产主义发展是一个没有问题的问题。这是一个自动的、无矛盾的过程，资本主义本身就完成了这个过程。资本主义竞争导致资本的集中，通过这种方式，在产业中发展出大型的集团。这样的一个集合体——例如，一个把运输、采矿、轧钢厂等结合在一起的托拉斯——形成了一个没有货币的分配领域。上级管理部门只是决定把新的生产资料（扩大的再生产）送到哪个工厂，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等等。根据这种理论，共产主义生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无非是进一步实行这种集中，然后很自发地导致共产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将被取代，原因很简单，它成为工业企业进一步合并的障碍。消灭了私有制，集中的过程就能充分发展，然后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把整个经济生活结合成一个巨大的托拉斯，然后由上面管理。这样，马克思为共产主义社会所设定的前提条件就得到了满足。市场将会消失，因为一个单一的企业不会向自己出售或购买。附在产品上的价格也随之消失，而上级行政部门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将产品从一个工业单位流向另一个工业单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有必要衡量每件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这显然是一个幼稚的错误。

因此，与共产主义经济有关的科学所采取的发展进程，并不是以一条直线的形式出现，而是在马克思之后，采取了一个不同的方向，直到1920年左右才回到它以前的经典位置。正是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意中帮助共产主义科学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向前迈出了慷慨的一步，这无疑是一个苦涩的讽刺。当看起来资本主义的崩溃是可以预见的，而共产主义即将席卷世界时，马克斯·韦伯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开始发展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批评。当然，他们只能将这种批评与希法亭式“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还有本质上是一样的——俄式“共产主义”，而作为希法亭的忠实信徒，纽拉特却要被迫承受这种后果。他们的批评最后表明，一个没有任何调节手段或会计控制手段的经济，一个没有用来衡量产品价值一般标准的经济，是不可能的。而事实上，他们的抨击找到了正确的目标。结果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造成了相当大的沮丧和混乱。在经济科学领域，共产主义的不可能已经被证明了，其理由很简单：在这样一种经济中，每一种形式的计划生产都会停止。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基础试图证明自己存在权利的共产主义，表明自己甚至比资本主义更不适合于有计划的运作方式！Block（译者未能找到1920年代发表类似言论的学者）接着又补充说，在没证明有什么控制手段来代替“市场机制”之前，他们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就连考茨基也失去了冷静，所以提出了一些最荒唐的建议，比如长期固定价格等等。不过，考茨基的这些疯狂转变有其积极之处，因为通过它们，人们认识到了建立社会调节和会计核算控制的制度之必要性，尽管考茨基当时实际设想的这种制度是在现今货币的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作为记账用的价值尺度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记录交换关系账目的方法”以及“一种流通手段”，货币将是不可或缺的。（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书目中文源未找到）

韦伯和米塞斯对共产主义的破坏性批评，在现实中起到了帮助共产主义经济研究的作用，克服了它的惯性，并将其置于真正的基础之上。正是他们唤醒了那些从那一刻起就不允许自己再休息的思想力量，因为正是从那一刻起，进一步深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一概念之间的关系才成为可能。

作为国家共产主义的对立面，各种工联主义（syndicalist）思潮在1910年左右开始出现，它们试图通过“工团”（”sydicates”）、“产业工会”或“行会”来继续资本主义生产。这些组织会将其利润分配给工人，或者让利润积累到一个中央社会基金中。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从来没有经过任何理论上的阐述，除非我们可以把奥托·莱希特（Otto Leichter）1923年在维也纳出版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调控》（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in a Socialist Society）这样的著作考虑在内。这一研究总体上是以建立在劳动时间计算基础上的社会调节和会计控制方法为基础的，无疑这是迄今为止在该领域所得的最好的努力成果。在这，由生产者-消费者自己掌握的自主经济管理理论向前迈了一大步。书中相当诚实地提出了问题，尽管我们认为，莱希特没有对这些问题形成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他还称，在他之前，莫里斯·布尔甘（Maurice Bourguin）曾试图把共产主义经济建立在根据劳动时间消耗的会计控制的基础上。据莱希特称，后者的思想方法与他自己的几乎完全一致。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承认共产主义经济中的核算控制必须通过劳动时间来实现，尽管这些经济学家都没有在他们的核算方法中采用生产资料的范畴。例如，沃尔高（Varga，译者认为是Eugen Varga，生于奥匈帝国）在《共产主义》创刊第2年中第9-10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不用说，由于上文所述的错误，结果毫无价值。

然而，不仅在经济科学领域中对问题的定义上可以看到进步，而且在政治因素领域也能看到进步。经济专家只从生产和分配的角度考虑共产主义。然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在现实中还有其他动机。国家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对他们来说是相当的无关紧要。他们同样拒绝接受它，是由于这个原因，即实践已经证明，生产机器可以在收归社会所有的同时，仍继续作为剥削机器发挥作用。例如，俄国革命确实从此政治角度揭示了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打听一下，现在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内部，有哪些关于新的共产主义经济的积极的思想和观念正在流传，我们就会发现，自主管理和运营的思想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点，还缺乏更详细的说明。尽管如此，现在每个人都认为，绝对有必要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明确性（clarity）。

2.自由共产主义

米勒-雷宁（Paul Arthur Müller-Lehning）在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小册子中，表达了对明确性的强烈要求。他反对这样的观点，即眼前的任务是造成普遍的破坏，而与此同时，探索如何重新组织社会的任务可以安全地留待无限的将来去处理（出处同上；第4页）。为了确定“在革命发生后如何实现无政府工团主义”（同上；第5页），必须要有一个方案。仅仅宣传经济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同上；第6页）。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把群众的自主性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但是问题是，群众的主动性究竟是如何表现出来的，群众今天和明天究竟要做什么——所有这些都还是模糊的，只是稍有些积极的意义（同上；第7页）。“许多宣言出现了，但是对于日常实践的问题，只有极少数的宣言能够给出明确而简单的回答”（同上；第8页）。以下是引自米勒-雷宁的小册子：

“不得不说，俄国革命很彻底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没有工资制度的社会，其切实的和经济的基础是什么？革命后的日子该怎么办？无政府主义将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牢记过去几年的教训，如果完全失败的结论不至于是无可救药的破产。旧的无政府主义的解决办法，不管它们可能包含多少真理，不管它们可能被反复唱了多少遍，它们没有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特别是，它们没有解决社会革命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任何一个问题。”（米勒-雷宁，《无政府工团主义》，第10页）

“没有这些实际现实，所有的宣传都是消极的，所有的理想全是乌托邦。是无政府主义必须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而且——这一点不能太经常地重复——已经通过俄国革命的痛苦经验不断得到了证明。”（第11页）

“经济组织以剥夺资本和解除国家武装为目的。必须取代资本主义和国家机关的正是工人的生产联合会，它必须作为撑起整个经济生活的支柱发挥作用。*基础必须是工厂，工厂组织必须形成新的经济社会组织的胚胎细胞。*整个生产体系必须建立在联邦式工农业组织的基础上。”（第18页）

“任何想看到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终结的人，必须用其他的现实和其他的经济组织来取代这些社会生活的现实。这只有生产者自己才能做到。他们只能集体地，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来做到这一点。在工厂里的集体，在工业中的集体，等等。他们必须组织起来，通过他们联邦式的工业组织来管理生产资料，从而在工业和联邦的基础上组织整个经济生活。”（第19页）

1927年出版的这本小册子，相比迄今为止其他试图澄清这个问题的所有小册子相比，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引人注目的繁多概念，而在于它确实试图吸收俄国革命的某些经验，并将其转化为未来阶级斗争的武器。对经济生活的联邦制设想源自俄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然而作者没完没了的证明，这实际上只是提出问题的第一次尝试，还没一个人能提供解决方案。

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塞巴斯蒂安·富尔（Sebastien Faure）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他在1921年出版的《普遍幸福》（Universal Happiness）一书中，描绘了他对自由共产主义的构想。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无政府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并不一定排除对社会生产集中处理和控制的体制。因为仔细研究他的“自由共产主义”体制，就会发现它实际上不过是庸俗的国家共产主义。事实上，该书没有科学考察的性质，而更多的是以乌托邦小说的形式表现，“自由共产主义社会”是在纯粹的幻想中成长起来的。然而，与“人人平等”、“自由合意”和“反对国家及国家权力的崇高精神原则”这样的词句相反，书中描写了一种生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对生产的控制权并不在生产者自己，这清楚地表明，至少在这个特定的阵营中，完全不用担心这位特定的作者会有任何证据来证明他自己对适用于共产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有任何理解！

富尔反对作为“自在之物”的权力，为此，他谈到了成千上百的线索和纽带，这些线索和纽带违背人们的意志强行把所有在现代生产机器中合作的人捆绑在一起。他写道：“这整个组织（即他的体系——编者注）是建立在自由合作这一鼓舞人心的精神原则之上的”（第213页）。然而我们认为，这不能成为任何生产和再生产制度的基础。如果生产者希望使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无论是否有“鼓舞人心的精神原则”的帮助，整个组织都必须在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生产者必须自己在工作场所决定生产者与社会产品的关系。他们必须计算每一种产品用掉了多少劳动时间，因为他们的劳动时间是他们在社会产品中的份额的尺度。只有这样，整个组织才能建立在经济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托某种飘浮在抽象原则之上的“精神”理想。

我们再次发现，要建立在生产者本身之间的互助关系，同样是通过没有清楚、稳定根据的“自由合意”（”free agreement”）来表达的。在这也没有明确清晰的基础，没有对产品从工厂到工厂之间的流转进行时间上的调节和会计上的控制制度。然而，没有这个物质基础，这些“自由合意”也仍然只是空话。“一个人试验这个方法，测试那个方法，把它们结合起来，再检验这各种方法的结果。由此产生的一致意见形成了，发出它的号召，并靠其结果的力量来推动，最后取得胜利”（第334页）。对富尔来说，这种以每个人的自由为基础，并通过所有人的一致而实现的基础，是再自然不过的。“自然界不也是如此吗？自然界的例子就在那里，清晰而鲜明。那里的一切都通过自由而自发的相互调解（accommodation）而结合在一起……无数微小组成部分，就像微尘一样，相互寻找，相互吸引，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原子”（第334页）。

在这方面我们要指出，从自然界得出的类比总是极其危险的，特别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富尔的方法“清楚而明白地”表明了它是多么地不充分。在他的世界里，一切都是通过“自由而自发的相互调解”而结合起来。然而，实际上如此奇妙的是，人类的自由概念被不加思索地转移到了自然领域。在“纯粹象征”的领域里，人们当然可以逃避任何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富尔完全忽略了这些“自由而自发的相互调解”在自然界中实际产生的决定性时刻；当然，这个时刻是由参与成员之间的相互力量关系决定的。如果太阳和地球彼此缔结了如果太阳和地球达成一个“自由而自发的协议”，即地球应在365天内围绕太阳公转，*这是特别地由太阳和地球的质量分别决定的*。这是他们达成“自由的相互调解” 的真正物质基础。

自然界中的物质总是这样有编排的。它的原子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物质在运动中，都是建立在相互对立的力的平衡之上。这种关系的精确形式，是由两个对立而又统一的伙伴之间作用力的具体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乐于采用自然界的这个例子，但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通过这些手段来说明，如果要在人类社会的条件下成功地缔结这种“自由自发的相互调解”，那么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准确关系就必须存在。正是通过这些手段，这种协议才从一句空话变成了现实。虽然很明显，富尔实际上从未关注过经济问题，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他是纽拉特学派的代表，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自然的”经济学家3，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个学派认为调节和核算控制的单位是绝对多余的，并建议通过借助统计数据的生产计划达到相同的结果：

“首先，还需要确定每种单独需求的总需求和数量……然后，各公社应根据居民人数，把这些需要报告负责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管理办公室，那里的官员由此得到一份‘国家’总需求的调查报告。然后，每个公社都会编制第二份清单，说明他们能够生产多少东西，根据这份清单，‘中央管理机关’现在能够评估‘国家’的生产力。这个过程的结果是非常清楚的。上级官员现在应该决定把多少比例的生产分配给每个公社，多少部分的生产可以留给自己”（富尔，《普遍幸福》，第215-216页）。

这个过程和国家共产主义者设想的完全一样：下层——群众；上层——官员，这些官员把生产和分配的经营和管理权保留在自己手中。这样的社会不是建立在经济实际状况的基础上，而是取决于个人意志的好坏，或者取决于他们的管理能力——这一点富尔倒很乐意承认。为了使人们不怀疑中央控制权的必要性，他补充说：“中央管理机关知道总生产和总需求的限度，因此必须通知每个地方委员会，它有多少产品可供支配，它必须生产多少生产资料”（第218页）。为了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切与任何一种具体的*自由共产主义*毫无关系，我们把它同希法亭描述的*社民主义式共产主义*4进行比较。我们会看到两者几乎字字相符：

“依据现有的自然和人工的生产条件决定制造新产品的方式、地点、数量和手段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的和全国的委员会。他们借助有组织的生产统计和消费统计的一切手段，把握杜会的需要，从而以自觉的预见、按照他们自觉地代表和领导的共同体的需要，组织整个经济生活。”（作者强调——编者注）5

由此可见，在这种形式的“自由共产主义”中，很明显，对生产机器的处置权是交给那些熟知统计艺术技巧的人的。人们本以为，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对政治经济学有足够的了解，知道谁掌握了生产机构的控制权，谁也就掌握了社会权力。上述“中央管理机关”不得不为自己提供使其意志生效的手段，也就是说，它必须把自己设置为一个国家。这的确是富尔体系的运动规律之一，不管这是不是其本意；这道菜是配上“自由合意”的调味料，还是配上“精神原则”的肉汤，也无关紧要。这种掩盖饭菜真味的调味品，丝毫不会扰乱实际的政治和经济现实！

问题的实质并不是说，人们会反对富尔的制度，认为它力图把整个经济体设计成一个单独的单位；这种结合的行为确实是发展过程的最终目的，这发展是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的。然而在做到这一点之后，就必须提供基础，*保证他们自己——生产者和消费者——把握对经济的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对每一种形式的经济活动耗费的劳动时间进行准确核算，以便他们能够确切知道在每一种产品中耗费了多少劳动时间。这样，就完全没有必要把怎么分配社会产品的决定权交给任何“中央管理机关”；相反，每个工厂或其他单位里的生产者自己就可以计算耗费的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点。

富尔的《普遍幸福》对我们关于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知识没有丝毫贡献。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这一工作，那仅仅是因为，通过对这种关于“自由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进行尖锐批评，就可以清楚地表明，最近十年来这个领域取得了多大的进步。1917年以前，人们要想揭示隐藏在这堆误导性词语中的国家共产主义内核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感谢俄国革命中实践学派的表现，因为正是这个学派以明确无误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允许一个中央政权确立自己的社会权力，然后将生产机器的一切权力集中在它的手中的后果的后果。

1 段落结尾处：“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禁忌知识之树的果实，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尽管俄国革命已经证明，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了一个例子，说明在一战中及其后的革命浪潮爆发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间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无产阶级革命将主要在欧洲范围内，在同一历史时期内较快地结束，简言之，一战及其后的欧洲革命浪潮将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曙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

除了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即这个信念的一个重要因素反映了当时参与革命的团体中普遍存在的主要基于情感的兴奋感之外，马克思主义者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弹性及其吸收激烈的矛盾动荡和社会对抗的能力是巨大的，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因此，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成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成熟之前，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不发达的边缘地区，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

2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第一章

3 “自然经济学家”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他认为一个没有阶级的、非对抗性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经济基础建立在“实物”交换即直接以物易物的关系基础上的社会。

4 在这里，“国家共产主义”比“社民主义式共产主义”更适合

5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第十五章结尾

第三章 一般再生产过程

1.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再生产是个别资本集团的职能

人类为自己创造了社会生产的机器，作为满足其千百倍需求的一种器官。生产工具——也就是说，集体生产资料——作为一种用来从自然中获取其生存和更高发展所必需的东西工具来为人类社会服务。在制造过程中，生产过程，我们的劳动力和客观的机器本身，都被消耗。这样来看，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是一个资源的使用过程。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被用完的东西在同一个过程中又诞生了：机器、工具和我们的劳动力被消耗，同时又被更新，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生产过程就像人体内的生命过程一样。从自我毁灭到自我更新，以一种持续的、更加复杂的形式：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1

对共产主义来说，这段话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生产和再生产是有意识地从这一原则中产生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这一过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地完成。再生产的依赖这样的事实：每消费一种产品，一般都必须有一个新的产品取而代之。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必须对进入生产过程的一切进行精确的核算。无论这看起来多么困难，实际上却很简单，因为一切被用完和毁坏的东西都可以分为两类：*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下，再生产是一种个人职能。每一个资本家，即资本的单位，都要满足自己的再生产需要。资本家要考虑损耗和用完的固定生产资料（机器、建筑物）、流动生产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消耗和直接消耗的劳动力。在这些基础上，再加上辅助性支出，如营销成本、保险等，最后资本家带着作为成品的商品进入市场。如果经营成功，那么一个生产周期就成功结束了。资本家现在购买了新的生产资料和新的劳动力，生产又可以重新开始了。由于所有的资本家都以同样的方式行动，结果是整个生产体系连同消耗过的劳动力都得到了再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系统生产力的提高，迫使资本家通过竞争，把他们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投入到额外的资本、新的生产资料和扩大的生产设备中去。其结果是生产储备的增长，包括生产设备的“死”部分和“活”部分。因此，不仅是那些在前一个生产时期被用完和毁坏的生产资料被再生产，而且——用资本主义的有关术语来说——还发生了积累。至于在多大的规模上和在谁的工厂里进行积累，则是个别资本家或资本主义集团的决定，他们的动机是与争取利润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在共产主义下，积累被称为*扩大规模的再生产*。在这里，市场和将商品（产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被消除了，但产品流动仍然存在：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2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3

因此，工业机构将其产品交由社会支配。然而，就后者而言，必须按最初投入生产的数量为工厂提供新的生产资料、原料和劳动力。实际上，如果要实现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向工厂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等要素。然而，这方面的决定权不再掌握在拥有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集团手中，而是由整个社会决定扩大生产的程度，扩大到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程度。如果说必须向每个工厂提供新的生产资料，其数量与生产中已经用完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相同，那么，为了进行再生产，每一个工厂都必须计算它已经以各种形式（也以劳动券的形式）消耗了多少社会产品，这是必要和充分的。然后我们以同样的数量替换这些产品，一个新的劳动周期就开始了。

如果要问，我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确定每个工业机构所耗费的劳动小时数，那么，现代成本会计学就能提供决定性的答案。由于种种原因，在1921年左右，资本主义的工业积累方法被迫进行了彻底的合理化改革。正是这样，在1922年前后出现了一整套新的文献，内容是发展了为每一个单独的生产过程和每一个单独的辅助劳动功能计算确切成本价格的新方法。这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例如：生产资料的数量、消耗的原材料和辅助材料、劳动力，以及每个单独的部分生产过程或特殊的部分劳动职能（如运输、社保等等）的管理费用。但是，它们都与一个共同的要素有关：货币。而工业管理人员认为，正是这一点阻碍了精准的核算。但是，没有什么能阻碍把它们转换成另一个会计核算单位。而且，在社会化生产的条件下，目前形式的公式往往是不稳定的，因为出现在成本预算中的各种因素——例如资本利息——将不再有意义。然而，这种方法本身仍然是一种持久的进步。在这方面，新社会也是在旧社会的子宫里诞生的！奥托·莱希特（Otto Leichter）在现代成本会计方面写道：

“资本主义会计控制方法，如果能持续地、毫无阻拦地引入工厂，就能提供准确的数据，显示任何半成品、任何仍在制造过程中的产品的价值，或者精确地指出每一项单独劳动操作的成本。他们可以确定在一个工厂的许多不同的车间中，在许多不同的机器或许多不同的劳动力单位中，哪一个特定的劳动操作可以更经济地进行；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被用来提高生产过程所达到的最高程度的合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会计方法的另一个成果是：每一个大工厂实际上还有一些成本和费用，对可交换的产品没有任何实际贡献。”(这里指的是官员的工资，工作场所的取暖成本等——作者。)“资本主义会计方法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它使这些详细成本得以包含在工程总预算中。”4

2. 公式 (P+C)+L= T. PRD(总产品)

出于这个原因，完全有可能在每一种产品上标明生产它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当然，有些设施不生产有形产品，例如社会和经济委员会、保健服务、教育等等；但是这些设施也同样能够确定它们消耗了多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因此，在这里也可以确切地揭示再生产的成本。如果我们想给再生产下一个简明的定义，那么我们就会说：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生产中的直接操作因素。在与自然的联系中，它们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大量的机器、建筑、食品、原料等使用价值形式的产品。一方面，这批大量的产品以不间断的方式从一个工厂流动到另一个工厂；另一方面，它被消费者的个人需求所消耗。**

每个工厂通过对生产资料(=p)和劳动(=L)的精确核算确保其再生产，这两个量以劳动小时为单位。因此，每个工厂的生产公式表示如下：

p + L = 产品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范畴包括机器和建筑物（固定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原材料和辅助材料（流通的生产资料）。如果现在我们用字母p来表示固定生产资料，用c来表示流通生产资料，那么，公式的形式如下：

( p + c ) + L = 产品

如果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现在用虚构的数字来代替字母，那么，比如说，一家制鞋厂的生产将会揭示下面的简略公式：

( p + c ) + L = 产品

也就是

（机械+原材料）+劳动=40000双鞋，以劳动小时(L-Hrs)计算，即

(1250 L-Hrs + 61250 L-Hrs) + 62500 L-Hrs = 125000 L-Hrs

因此，求平均值：

125000劳动小时除以40000双鞋等于每双鞋3.125劳动小时。

在这个生产公式里，工厂同时也发现了它的再生产公式，这个公式表明，为了更新已经用完的一切，必须要恢复多少个代表社会产品的劳动小时。

这个原则适用于每一个单独的工业机构，对整个共产主义经济也同样适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后者只是经济体中在任何给定时刻活动着的所有经济设施的总和。对于社会总产品来说，同样也是有效的。它不过是所有经济机构总和的产品(p + c) + L。为了与单独的工业企业的生产核算控制范围相区分，我们对总产品使用如下公式：

(P + C ) + L =总产品

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工业设施中所有用完的机械（p）的总和＝1亿个劳动小时，原材料（c）＝6亿个劳动小时；如果还消耗了活劳动力的6亿个劳动小时（L），那么社会总生产的简略公式就会如下：

( P + C ) + L =总产品

( 100 M+ 600 M ) + 600 M = 1300 M劳动小时

因此，所有工业设施加在一起，要从社会总库存量中拿出7亿劳动小时的产品来对生产设备的物理部分进行再生产，而工人则消耗6亿劳动小时的最终社会产品。这样，所有生产要素的再生产就得到了保证。

现在让我们特别考虑一下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在我们的例子中，有6亿个劳动小时可供个人消费。不能也绝不可能消费比这更多的劳动，因为在工业机构中，只有6亿小时的劳动时数以劳动券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然而，这与产品如何在工人中分配没有关系。例如，非技术劳动、技术劳动和智力劳动都有可能得到不同的报酬。例如，分配工作可以这样进行：非技术工人每工作一小时按比例获得四分之三小时的报酬，非技术工人正好是一小时，官员和领班则是三小时。

3.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所持的价值概念

实际上，经济学家阁下们确实认为应该这样安排分配！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给劳动以同等的价值，也就是说，分配给每个人相同份额的社会产品。当然，这就是纽拉特“不同的生活水平”的意义所在。社会统计学家确定了必要的最低标准，然后使“非技术的”（”unskilled”）工人的收入与之相符，而其他人根据他们的努力程度、能力和劳动的重要性获得更丰厚的报酬。纯粹是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

考茨基认为这种报酬上的差别是必要的，因为他认为，对于不愉快的或繁重的劳动形式，同比较愉快的和比较轻松的工作相比，应该支付较高的工资。他顺便说，对他来说，这提供了证据，证明劳动时间核算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同意莱希特的意见，甚至建议即使在每个职业内部也应保留报酬上的差别，因为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考虑到技术工人所需要的额外培训等等，支付给个人的实际工资将不可避免地高于基本工资率(wage rate)。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例如，有观点认为在共产主义经济中应保留工资标准。对此，莱希特十分正确地指出，这并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劳动小时核算的引入，这也可以从我们的例子中看出这一事实。他说：

“存在着纯粹的技术上的困难，这在资本主义下也存在，即为每一个单独的劳动职能支付的工资必须单独确定，但这与资本主义下使用的方法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复杂之处。”5

我们看到，莱希特认为，不同的劳动评价尺度、不同的工资率的应用，以及同一类型的劳动中确实存在的差异，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然而，这只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并没有停止*，社会产品的分配仍然带有对抗性，争取产品分配的斗争仍然在继续。这种斗争实际上只不过是*争取权力的斗争*，而且必须作为对权力的斗争来进行。

没有比上述更明确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些“社会主义者”除了对千百万工人实行统治和支配的形式外，根本无法设想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对他们来说，人类只变成了臣民。他们不过是生产机器的一部分，社会统计学家必须计算需要向这种人力材料提供多少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最低生活水平），以保证劳动力能够自我更新。工人阶级必须全力反对这样的观点，并要求**大家**在社会财富中享有同样的份额。

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初阶段，起初可能需要对各种知识分子职业给予较高的报酬；例如，40个小时的劳动可以得到80或120个小时的产品。我们已经看到，这对劳动时间核算方法来说并不构成困难。在共产主义社会形式的初期，这确实是一种公正的措施，例如，高等教育的手段并不是人人都能免费获得，因为社会还没有在新的基础上充分彻底地组织起来。但是，一旦这些事情得到了安排，那么就不可能再有让知识阶层从业者在社会产品中占有更大份额的问题了。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摆脱对劳动能力的不同评价的概念，其根本原因，其中之一在于他们所处的阶级状况。总产品的平均分配完全与他们的阶级意识相矛盾，因此是“不可能的”。然而，人们从感觉的或感性的世界中获得有意识的思想概念，即使这不是一种古老的，那么至少是一种正确的原则，对于这些人和其他人一样，智力一般不与感觉的世界所支配的东西相矛盾。例如，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莱希特可能希望消除价值概念，因为它适用于非个人的再生产，但在涉及劳动力报酬的地方却无法摆脱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是作为商品出现的。雇主支付的平均工资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相对应，就非技术劳动而言，这些成本或多或少处于生存所需的最低水平。一般来说，非技术工人的孩子是无法学习一种专业技能的，因为他们必须尽早开始挣尽可能多的钱。6这就造成了一种情况，即非技术劳动只能作为更多的非技术劳动力进行再生产。而对于技术劳动力的再生产来说，更多的成本是必要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孩子们接受了职业训练，这就意味着技术工人本身已经再生产了技术劳动力。莱希特认为，劳动力的这种商品关系在“社会主义”下也适用。他写道：

“因此，劳动显示出各种劳动的资格，各种劳动的强度。各种质地不同的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不同程度的投资。合格的劳动者为了使自己的劳动力一天天地或一年年地再生产，需要更多的投资，也就是说，他们的经常性支出是较大的。一般来说，如果以前负责这种发展中劳动力的人不再有工作能力，那么就需要加大投资，以培训和促进合格的劳动力，直至其完成，达到具有相同教育和知识替代水平的人的标准。在评价各种劳动力的价值时，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7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一点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力价格的分析进行比较，那么，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完全清楚了，他们无法从价值概念中解放出来。

“那么，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是什么？

它是维持工人作为工人和把他培养成工人所需要的成本。”

因此，任何工作所需要的训练时期越少，工人的生产成本就越小，工人的劳动价格即工资就越低。在那些几乎不需要任何学徒期的工业部门中，在工人仅仅身体存在就够了的情况下，工人生产所必需的成本几乎只限于使工人活着和能够工作所必需的商品。因此，工人劳动的价格将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

……. 同样，在计算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时，也必须包括再生产的费用，这样工人的种族才能繁殖，才能用新的工人代替损坏的工人。这样，工人的折旧就和机器的折旧一样被考虑进去了。

“总之，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作最低工资额。”8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机器的非个人部分的再生产是个别资本集团的职能，在这种制度下，劳动力的再生产也是工人的个别职能。然而，在共产主义下，与生产机器的非人部分的再生产成为社会职能一样，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同样成为社会职能。它不再成为单独的个人的责任，而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例如，教育程度不再依靠父亲的钱包，而完全取决于孩子的才能、心理和生理特征。在共产主义下，没有人会想到，那些天生就具有更有利的遗传特征或更有利的内在能力，并因此能够最大限度地吸收人类社会在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所有成就的人，应该在社会产品中额外获得更大份额。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在艺术和科学知识方面取得超越常人的成就的可能性，但只是为了使他们能够以更有才能、更密切的合作形式完成所有的文化任务，把那些原来以文化产品的形式从社会中拿出来的价值还给社会。共产主义下的社会产品的分配，并不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是社会通过一切技术资源和其他资源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配。考茨基、莱希特和纽拉特版本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想用他们的“依据不同生活标准的报酬”的原则来达到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低收入工人在营养和其他家庭和家庭评估的基础上确保生存所必需的最低生活标准，而收入较高的人则消耗剩余。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与消灭剥削的思想相去甚远。的确，他们希望继续剥削，只是这一次是在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的基础上进行的！

对我们来说，劳动力的再生产只能意味着社会产品的平均分配。在计算生产时间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是按其实际数量记入的，而每个工人则从社会产品中拿走他所耗费的实际劳动时间。

在那种反映和基于“最低生活水平”统计数据的“社会主义”中，生产者把自己的劳动能力交给一个巨大的、未被定义的权威，这个权威被委婉地称为“社会”。然而，凡是这个未定义的权威实际以有形的形式出现的地方，它都是以一种凌驾于生产者之上、与生产者对立的异己力量出现的，是一种把自己提升到生产者之上、剥削生产者、统治生产者的力量。它实际上是通过生产机器进行的统治，这种机器现在是一种国家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生产者作为无个性的因素发挥作用。

[1] 《资本论》，第一卷

[2] 《哥达纲领批判》，“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第一章

[3] 同上

[4] O. Leichter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pp. 22-23.

[5] O. Leichter: ibid, p. 76.

[6] “一般来说，非技术工人的孩子是无法学习一种专业技能的，因为他们必须尽早开始挣尽可能多的钱。”

虽然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的特殊形式的运作方式基本上仍然是正确的，但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通过实行义务中等教育和大学助学金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变（在“工业化”国家）。然而，尽管进行了这些改革，上层和中间阶级的子女仍然在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占主导地位。

[7] O. Leichter: ibid, p. 61.

[8] 《雇佣劳动与资本》

第四章 作为生产基础的社会平均生产时间

1.考茨基的定义